

引 论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在本书中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史，首先是实践的历史，同时也是思想的历史。从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推动着实践向前发展。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尤其是自 1927 年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之后，领导亿万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与斗争，从没有一兵一卒，到建设起数百万人的强大军队，从被敌人诬蔑为“草寇土匪”到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领导力量，创造了惊天动地、彪炳千秋的业绩。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洗往日的屈辱，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新享有自己的独立与尊严，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概括和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从博大精深的传统兵家文化中吸取精华，进行缜密深邃的理性思考和加工提炼，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国防现代化等有机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它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对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巨大指导作用，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思想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系，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有这样的看法。首先，两者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反映了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是由一整套基本原理和指导原则通过严密的逻辑架构组织起来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军事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科学性、真理性和完整性是它的突出特征。而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却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军事思想，具体表现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建国后关于军事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反映了军事工作客观规律的属于真理范畴的认识占了主导地位；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也发生过认识上的偏差以至于谬误。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层次、科学性和方法论意义，显然都高于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同时，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着的。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它同样适用于建国以后的军事工作。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中，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第二，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许多指导原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制定的，反映了作战与建军的一般规律。在基本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之前，这些原则对新中国的军事工作仍然是起着指导作用的。第三，同一切科学理论一样，产生和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本身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党的军事工作的领域和范围、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军事实践的内容更加丰富，这就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源泉。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原则和观点，都是根据建国以后的军事实践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是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理论升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理论，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

东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搞清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中国军事思想两者之间这种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当代中国军事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党中央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党中央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作为毛泽东、邓小平领导军事工作的得力助手有的长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的担负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他们参与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重要决策，以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许多精辟的理论阐发，为新中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著作的结集出版以及新的档案材料的不断披露，这方面的细节对人们已经不再陌生。研究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历史，自然不应忽略他们的贡献和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现实，制定了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党的军事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这不但说明当代中国军事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棵常青的理论之树，深深地植根于军事实践的沃土，不断从实践中吸取养分，将更加枝繁叶茂。

军事思想不是军事家凭空臆造的，而是来源于军事实践。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活动的发展，我们认为可将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3 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

此为建国初期；(二)从 1954 年我军全面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到 1966 年初毛泽东开始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此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三)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到 1976 年 10 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召开了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种分法与党史、国史的分期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细微的差别。即以 1953 年底、1954 年初为第一阶段的下限和第二阶段的上限。这是由建国后军事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经济领域领导了以改变所有制性质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配合这一中心任务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这一任务到 1956 年完成。也就是说，到 1956 年，我国才从总体上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在军事领域，情况稍有不同。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部队进入和平时期。为适应这种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任务。1953 年底至 1954 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是军事工作的中心任务，随之，我军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基于这种理由，我们把第一阶段的下限和第二阶段的上限分别定在 1953 年底和 1954 年初。这不是作者的创见，而是目前军事学术界的共识。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的阶段性和阶段性，归根结底，是由军事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所决定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围绕着军事工作的中心任务，发表文章和讲话，作出各种指示，集中精力解决当时军事领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阐述他们对于军事工作和军事问题的见解，使得军事思想的主体相对比较集中。对此我们不妨先作一个提纲挈领的回顾。

在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但战略追击仍在进行当中。大西南、大西北、华南等广大地区还没有解放，新解放区

的匪患也很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战争尚未结束。所以在开国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很大一部分精力仍用于指挥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追击和剿匪工作，我军的战略战术理论由此增加了战略追击的内容。战略追击的硝烟未散，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派军队侵略我国的台湾海峡。党中央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我国的安全。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各个阶段，毛泽东、彭德怀将帅协谋，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提出了适应朝鲜战场特点的作战原则，指挥志愿军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美国侵略军，我军有了同现代化敌人作战的新经验。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全面建设时期是军事思想大繁荣、大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和成熟的。毛泽东总览世界风云，对国际形势作了高屋建瓴的观察和分析，认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并存，但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根据这一判断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了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了“三结合”的国家武装力量体制，规定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指导人民解放军顺利实现由以作战为主向以和平建设为主的战略转变。当时，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贺龙领导国防工业，聂荣臻领导国防科技和尖端武器研制，叶剑英、刘伯承主持军事教育训练工作，叶剑英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罗荣桓、徐向前主持民兵工作，罗荣桓领导军队政治工作。他们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都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发展。但是，在健康向上的主旋律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这就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

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着“左”的错误在党内

和军队内占据主导地位。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施展反党乱军的阴谋，严重败坏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阻碍和迟滞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正常发展进程。政治上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的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仍然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之后，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据此制定了正确的国际战略。他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并且始终没把军队的领导权交到江青之流的野心家手中。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了事关党和军队前途的真知灼见，领导军队、国防建设工作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战略家的睿智，深入考察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果断作出遏制战争的和平力量在增长，大战在相当一个时期打不起来、并有可能被制止的科学判断，由此确定了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造性地提出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构想。在肯定全面建设时期党对军事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针的基础上，他领导国家和军队完成了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到和平建设的新的战略性转变，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要求人民解放军毫不动摇地服从和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续发扬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建军光荣传统，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重新确定了部队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在明确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前提下，他要求深入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关心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军事法制建设。这一切，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新时期军

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指导纲领。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的一部分（仍在发展中），与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共同的哲学底蕴。同时，与后者相比，它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从属性上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我国的国家体制决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时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军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这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工作和国防工作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国家关于军队工作和国防工作的指导思想，它兼具党的军事思想和国家军事思想的双重属性，这两者是统一的。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党的军事思想不是国家的军事思想，至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军事思想。但是，应予强调的是，革命战争年代也好，建国以后也好，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根本性质，却都是始终如一的。其次，从军事思想涵盖的领域和适用范围上看，当代军事思想较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思想在这些方面都大大拓展了。军事思想的涵容性取决于军事思想的客观对象自身。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以进行战争为主转入到以全面建设为主，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必然引起军事思想的变化，不只是逻辑外延扩展了，内容也在更新。这里又可以分几点来说：

第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其他都是次要任务，是从属和服务于主要任务的。譬如，军队以作战为主，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不能影响更不能取代战斗队的任务，军队不能放着仗不打专门搞建设，部队的休整只能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军队的作战任务减轻了，不再居于主要地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力探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重新规定军队的中心任务。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

队的系统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基础之上的。

第二，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弱小和防御的地位，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与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军事工作决策人主要考虑的是人民军队与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后，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争取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祖国安全的重大责任，就历史地落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的身上。于是，国防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作为国家大计的最高决策层，视野要比与国内敌人斗争的战争年代开阔得多。这时，他们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国家安全问题，就必须对国际形势与发展趋势作出精确的判断，对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估计，区分我们的朋友与敌人，制定我国的国际斗争策略，由此产生了国家的国际战略思想。可见，当代中国军事思想与战争年代的军事思想相比，现实指导性更强，覆盖范围更大，战略层次更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重要的发展。

军事思想是用来指导军事实践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军情的。战略追击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历次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巨大成就，尖端武器研制的突飞猛进，万里边防和海防的日益巩固，都是军事实践对这一结论作出的有力证明。毋庸讳言，我们也有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走了弯路的沉痛教训。鉴往知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将会使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得到更加顺利、更加迅速的发展。

基于对军事思想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对保卫国家安全、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指导作用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对军事思想的研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① 60年代中期，他亲自组织专人研究美国和苏联的军事战略。邓小平在新时期也指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 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军事科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研究。当时，在这方面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 如政治气氛的不宜 教条主义的流行 许多人为樊篱的设定 材料的匮乏，使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研究成为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在许多研究著作中，对这方面的内容的处理，要么浮光掠影，要么付诸阙如。8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变。大量历史资料的整理公布和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的问世，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选定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体现宏观与微观兼顾、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精神。以宏观为主，主要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对国际战略格局的认识，对军事哲学的思考，对军事工作的路线、方针的确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同时适当兼及他们对一些具体工作的指示；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军事思想内容为纬，经纬结合，介绍和评述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发展以及与军事思想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同时照顾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层次，尽可能地作些必要的概括与归纳，以期眉目清楚。还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对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作了阶段的划分，但军事思想的发展有其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42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自身的连贯性，一些基本问题始终都是存在的，不过是时隐时现、时起时伏而已，再则有些军事工作和任务本身就是跨越不同阶段的，所以在叙述一些问题时，为使主题突出，也有把不同时期的材料集中起来介绍的情况，想必读者能够体察。

时光如流水，共和国即将走过半个世纪的里程，公元纪年的第二个千年也将来临。世纪末回眸，我们正处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历史为我们国家的发展，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落后与贫穷的“第二次革命”，它像一座气势恢弘的大桥，连结起民族的历史与未来，一端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灿烂辉煌，一端是令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前景。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会实现。然而，和平和建设要有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来保卫。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战争的危险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局部战争烽火频燃，永久和平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严峻的挑战。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人们已不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佑上面，而军事实力在当今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却越来越大。世界上不就有那么几个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搞霸权主义政治，动辄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施加压力，不惜以战争相恫吓，甚至用武力来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的主权吗？对信奉“实力至上”的人，必须用实力来对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愿意与一切国家友好相处，我们绝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去主动侵略别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我们的国家一定要统一，一切侵略中国和分裂中国的企图都将受到坚决的打击。我们坚信，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中国

的综合国力将全面提高，人民解放军将更加强大，社会主义祖国将永远坚如磐石，牢不可摧。这也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第一编



由战争走向和平：建国初期的 军事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迈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党对中国大陆长达 22 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这是就社会性质的变革而言的。实际上，当时国内尚未完全结束战争状态，全国范围的和平还没有彻底实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追击大陆上溃逃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作战，同时进行了剿灭各地反动土匪武装的作战，以期最终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清除出大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燃烧到朝鲜半岛，侵入我国的台湾海峡，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开始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这是一个由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从历史进程上看，建国初期的军事工作，尤其是战略追击和清剿残匪的工作，与从 1946 年开始的人民解放战争过程是密切衔接的，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仍是“一切围绕着战争”。但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时期的军事工作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和平时期的正规化建设逐渐成为军队工作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在此前长达 22 年的武装斗争中，产生了自己关于军事工作和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建国初期的军事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军事工作的指导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都是围绕着当时军事工作的实际展开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发展

第一章

在大进军中发展的战略追击思想

解放战争是从 1949 年春进入战略追击阶段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轰鸣声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继续指挥了大规模的战略追击行动，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锐不可挡之势向东南、华南、西南、西北各地疾进，最终消灭了一切在大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中，也增添了以大迂回、大包抄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追击理论。

一 向全国进军的战略筹划和部署

战略决战阶段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时期。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震惊寰宇的大规模战略决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战略决战阶段，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二百三十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将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战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 260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2 亿。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 358 万人，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军政素质也进一步提高，战斗力更加强大。我军士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除原有的炮兵外，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中共领导下的南方各省游击武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已达五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苏、皖、浙、闽、赣、湘、粤、桂、黔、滇等省的二百多个县境，成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我军在政治觉悟、军事实力、后勤保障等方面已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统一战线工作蓬勃发展，大批民主人士络绎不绝地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中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与中共联系，表示愿意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投向人民。人民革命战争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了。

敌人方面的情况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到 1949 年 1 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到 200 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 140 万人。这些部队分散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经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这些处于孤立态势的国民党重兵集团，除少数未受到我军严重打击而仍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拼凑的，或是多次被歼后重新补充的，战斗力很弱。而且国民党统治区内财政枯竭、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四分五裂之中。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一方面收集残部，加紧布置长江防线；另一方面空喊“全面和平”，企图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首先利用长江防线，拒我于长江以北，以争取时间扩编军队，赢得喘息机会，伺机卷土重来。为此，惯

于玩弄反革命两手的蒋介石，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 1949 年 1 月 1 日发出了所谓的“求和声明”；处于穷途末路的他随后又宣布“引退”，把李宗仁推出来做代总统，出面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介石表面高唱和平暗中磨刀霍霍的鬼蜮伎俩早有领教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没有被国民党的“和平”鼓噪所蛊惑，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不拒绝与敌人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并及时作出了向全国进军的英明决策。

1949 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谆谆告诫全党：“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不管敌人如何变换斗争方式，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 年 1 月 6 日到 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毛泽东指出：

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